

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进及启示

李大勇 李安增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对经济发展多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一个较长时间内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选择的根本途径和方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基于不同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差异和社会需要,提出和实施了几个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实现跨世纪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工业化战略

实现中国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以摆脱苦难的境地,是先进的中国人近百年来一个宏愿。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共产党开国后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

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关于建国初期的社会发展路向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达成一个共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短则十几年,长则二十几年),“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步到位,在全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说,我们曾经设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实现工业化。这种先建设后转变的“先后战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适合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这一特殊国情的。到1952年底,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实践证明,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运行是良好的、有序的,它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带来了稳定和发展。但同时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开始改变,先是批判了刘少奇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观点,其后便明确提出了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总路线,并最终中断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时间大约是15年左右。在这期间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改

造与建设同时并举的“并举战略”。“先后战略”与“并举战略”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和模式。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改变原定的设想呢?

从国际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两大阵营。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处于衰败状态,而社会主义阵营则充满了向上发展的活力,尤其是苏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创造了落后国家走向工业化的奇迹,又依靠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赢得了反击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为苏联社会主义赢得了声望。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两种社会制度尖锐对立的国际环境中,作为近代以来一直遭受帝国主义凌辱的中国,痛感没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的无奈,我们的领导人自然希望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现有的物质条件,尽快让中国富强起来。在我们的心目中,已经强大起来的苏联无疑是制度选择的楷模。从苏联方面讲,它对我们党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政策也颇有微词,1952年刘少奇、周恩来访问苏联时其领导人都希望中国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把这当作全面援助中国的前提条件。

从国内情况看,到1952年,我们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国家政权得以初步巩固,尤其是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有了上升,即从1949年的30%上升为41.5%;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增长,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并占了绝对优势。这说明我们已经获得了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矛盾也突出起来。在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的条件下,我们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农村土改的绩效是显著的,但此后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觉的问题,譬如,贫富两极分化、雇佣劳动、债务剥削、土地买卖、租佃和典当,均有了相当的发展。这与我们实现平等、消除剥削的奋斗目标是相悖的。

这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感到一则有提前进行改造的必要性,二则也具备了实行改造的客观环境。

1953年底,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编写、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了新中国历史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化战略。首先,界定了我国工业化的性质,即我们要实现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其次,初步提出了工业化的标志。即使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居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再次,规定了实现工业化战略步骤与方针。即从1953年开始,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些时间,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此同时,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后,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重点。即以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处理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研究了早发工业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以重工业为重点,带动轻工业和农业,用多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发展经济学家把这概括为“工业化以农业为先导”的命题。因此,毛泽东的观点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就工业化战略的总体而言,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抓住了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基础和国际条件等有利因素,及时推动了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合理性。从实际执行的结果来看也是好的: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7.8%,国民收入增长了53%,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22.9%,经济效益也比较好。然而,这一战略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其一,这一战略偏重于社会主义改造。从总路线的文字表述理解,既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又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总路线提出的任务才算完成。但要在15年左右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总路线是将工业化和改造任务并重的,在解释总路线时还强调工业化是“主体”,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但总路线提出后的客观印象却是强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淡化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抓作为“主体”的工业化建设,而是抓作为“两翼”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曾明确地说: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抓社会主义改造。而他本人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其结果是,工业化进程相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严重滞后。

其二,总路线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只有经济方面的内容,缺乏上层建筑与精神文化方面内容的规定。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全面的过渡,首先是指经

济结构方面的改变,同时也包括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实现工业化是其核心内容,但现代化又不仅仅限于工业化,它应是涵盖政治民主、文化发达、道德高尚等内容的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

其三,没有摆脱早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从世界范围看,政治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大都仿效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方法和传统,把实现最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作为最高奋斗目标,大量建设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化工厂,进行大规模的集中生产。我国初期的工业化战略显然具有这样的特征,以粗放经营方式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孕育着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

二、“超英赶美”的跃进战略

赶超战略酝酿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总的构想是分两步用50~7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6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分两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设想。1955年3月,他更明确地说:“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又阐述说:我们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后,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这是一种责任。”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我国将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第一步任务,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将赶上或超过美国。这一设想尽管缺乏科学论证,但还是比较求实、比较谨慎的,它集中反映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代表了几代先进的中国人振兴中华的理想,是我国经济复兴的伟大纲领。

1957年11月,毛泽东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对原来设想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作了较大改变。赫鲁晓夫在11月6日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赫氏奔放的思想,使着一直有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强烈愿望的毛泽东受到莫大启发,在事先征得其他领导人同意的情况

况下提出了中国要在 15 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如果实现了 15 年赶超英国的目标,将意味着中国用 23 年的时间走完英国 120 年所走的路。这对于渴望早日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对这个目标的追求,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着眼点发生了由从中国实际出发到快速赶超出发的不正确变化。

1958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向全国公布了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构想而确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首先用 15 年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然后再用 20 年到 30 年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赶超战略开始脱离中国实际,主观的东西开始占主导地位。1958 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指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以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接着在 5 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7 年赶上英国,再加 8 年或者 10 年赶上美国”的口号;此后,毛泽东又一再缩短赶超的时间,9 月 2 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李富春等人的信中说:“为 5 年接近美国,7 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这就是说,要在短短十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达到原来设想用 50 年至 75 年才能完成的目标。原来设想的战略目标变成了眼前的具体目标,远景规划变成了现实计划。赶超战略理论与实践走向了极端,陷入了空想。

盲目的赶超引发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错误。这一体略突出地强调在短期内提高钢铁等几种主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这导致了多方面的恶果:一是过分突出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地位,期望实现“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但却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二是大幅度提高了原订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计划指标,例如 1958 年的钢产量要求比 1957 年翻一番达到 1 070 万吨,开了以高指标为指挥棒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先河;三是在指导思想把速度看成是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选择了超常规的“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随着赶超英美所需时间的一再缩短,人们便把赶超战略与向共产主义过渡联系起来,作为二位一体的战略目标。正如《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说: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其结果,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没有过上,反而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三年的严重困难,我们不得不进行长达 5 年的经济调整。

就毛泽东采取赶超战略的理由来看,应该说是充分的,有着合理内核。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作过分析,在此不再赘述。至于如何评价赶超战略,学术界大多持否定态度,把它看成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代名词,是“左”倾错误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似欠公允。我们认为:

首先,赶超战略本身无可厚非。中国是世界上典型的现代

化后来者,发动时间晚于英美法等先期工业化国家一个多世纪,而经济起点却几乎低于所有的先期工业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大大压缩了的赶超过程。如果我们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建设速度,被动挨打的局面就永远无法改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成了一句空话。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为我们规划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总是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真知灼见,实际上就是一种立足于国情的科学的赶超。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赶超战略中所固有的真理性内涵。

其次,赶超战略并非异想天开。如果我们对各种条件加以综合分析,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的五六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赶上美国这种本来意义上的赶超战略的实现是有某种可能性的。理由之一,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能更好更快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实践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高速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真理。理由之二,中国人民是倾心为其奋斗的。“超英赶美”口号是人民由于解放而迸发出来的高昂的热情和追求更高目标的强烈愿望的一个具体体现。一个饱经忧患、任人宰割了一百多年的民族,突然爆发出这样高涨的热情,这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意义。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的主动性对于它的成败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这是最可宝贵的财富。假如我们引导得当,就会变为最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出中华民族腾飞的奇迹。像亚洲的日本“四小龙”正是奉行这样一种赶超战略,才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缩短甚至赶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经过 17 年的跳跃式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四番,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当然,我们不能把条件迥异的中国、日本加以简单的类比,但如果资本主义国家能办到的事,社会主义国家反而办不到,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成了一种纯理论上的逻辑推理。因此,如果我们精密组织、科学管理,坚持速度和效益并重的原则,不发生像“大跃进”、“文革”那样全局性错误,实现赶超英美的目标应该有可能。

赶超战略之所以以悲壮的失败而告终,首先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建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遵循其固有规律。如果忽视了革命和建设之间的重大差别,把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简单用于经济建设,失误是必然的。其次是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搞经济建设,必须使指标、速度与国力相适应。当指标、速度等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事情就会走向反面。第三是忽视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曾经有过通过技术革命加速经济发展的光辉思想,但 1957 年反右派之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了较大改变,他更加强调通过政治性的精神激励,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加速经济的

发展。“大跃进”期间，大搞所谓“小、土、群”，科学几乎无立足之地。用这种近似原始的手段搞现代化建设，失误是必然的。

三、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

建国后我们强调的目标一直是工业化，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的构思，由工业化开始向现代化转变。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4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宏伟目标。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的较全面的发展目标。

关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步骤，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三年经济严重困难，使毛泽东又回到了原来那个比较客观的起点上，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了办不成，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1961年他在几次接见外宾时都说过，中国准备用50年到100年来根本解决工业、农业生产问题。大跃进也需要几十年到100年时间来解决问题，使很穷的国家变成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在这之后，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党又提出我国经济建设“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起）开始，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¹⁰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用23年时间（从1978年到200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此，会议还拟定了10年规划纲要，要求到本世纪末，我国农业主要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或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毛泽东关于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考，对后来我们党提出“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毛泽东对我国经济的落后现状，特别是改变这种现状的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对经济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一方面，毛泽东在论及“长期性”时，往往更侧重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1962年8月，他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就特别强调：“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50年、100年或更多的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有阶级存在，不要忘记还有阶级斗争。”¹¹另一方面，毛泽东虽然提出了经济建设的长期性，但他又积极主张缩短时间，并认为这是可能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过于看重我们在政治方面的某些优势，低估了经济文化的落后现状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

制约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误认为搞建设不会比打仗更难。在毛泽东看来，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群众运动，就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和苏联。

用四个现代化代替工业化，不仅内容更为丰富，而且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更为深刻了。应该说，四个现代化战略在发展目标、战略方针上要比前两个战略符合实际，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四化战略本身仍偏重于经济和科技，未及制度和思想、政治、社会层面。在实现这一战略的时间规划方面，二十七年的时间似乎也太过短促。在具体的实施方面，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原则，忽视对外开放，关起门来搞建设，使我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影响了社会的进步。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战略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而几上几下，基本上停留在设想阶段，没有很好地加以贯彻。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整个中国处于动乱之中，发展经济甚至成为一种罪过。“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沿用我们曾经使用过的跃进战略，又导致了以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外国设备为主要特征的“洋冒进”，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再次受到严重挫折，比例严重失调，不得不进行新的调整。四个现代化的实践没有达到理想的胜境。

四、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反复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了更加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是这一新战略的总设计师，他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设计了一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首先，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总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在1979年接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要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四个现代化达到某种目标（即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把现代化的目标作了明显的降低，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此后，邓小平在谈话中又多次谈到：翻两番目标实现后再花30年至50年，就可以有一个中等生活水平，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战略构想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中共十三大在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制定了党在这一时期的基本路线，把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由四个现代化发展成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更加全面和科学的现代化。“富强”体现的是经济现代化的要求；“民主”体现的是政治现代化的要求；“文明”则体现的是文化现代化的要求，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其次，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邓小平又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1987年4月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明确地说：“我们

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至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⁴²1987年党的十三大肯定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正式提出了“三步走”战略。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肯定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并把它纳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系之中,提出了近期和长远的三个奋斗目标:在90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2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五大又对21世纪的近期和长远的三个奋斗目标进行了总体构思: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就使“三步走”战略更加具体化、规范化了。

再次,与实行“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相适应,邓小平规定了这一战略的重点,即“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⁴³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能源和交通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就在于把教育和科技视为战略关键,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他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发展科技,必须以战略眼光抓教育。教育的发展必须坚持“三个面向”的战略方针。科技发展了,教育上去了,有了人才资源,现代化建设就有后劲和智力支持,我们的目标就能实现。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的新认识,即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转变。

最后,在实施这一战略的途径问题上,邓小平把改革开放当作发展生产力的动力。邓小平之所以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切入口,来自他深邃的世界意识即运用世界眼光对全球发展态势的科学洞察及对我国社会现实的深层透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社会主义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都形成了以国家垄断为深层本质的僵化体制。它一方面根本排斥市场机制,阻塞商品流通,闭关锁国,处于世界大市场之外,压抑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导致国家主体化的倾向,压抑着广大劳动者和劳动集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妨碍着人的主体性

的开发升华。这种体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已完全丧失了其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⁴⁴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改革是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改革,因为单线的推动是不可能深入并获得成功的。通过改革建立的新体制及其运作,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依托与支持。从世界现代化和经济国际化、市场一体化的战略大局着眼,邓小平认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开放。对外开放不但可以有力地促进我国与外部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加快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速度,而且能够在社会的制度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形成有利于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良性机制。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是启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活力之源。

“三步走”的战略,既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两步走”战略的继续和深化,又是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现代化进程而制定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纲领,是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首先,这是一个积极的目标。要实现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必须达到7.2%,这样的速度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从世界范围看,从1961年到1980年这20年间,发达国家发展速度超过7.2%的只有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美元增加到4000美元左右,英、美、法、德等国家大都用了200年的时间。中国50年代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70美元,如果到下世纪中叶要提高到4000美元,那么我们将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其他国家200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

其次,这一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现在第一步、第二步的目标已顺利实现。至于第三步发展目标,只要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4%即可实现。尽管由于基数不断扩大,要持续保持较高的速度不容易,但考虑到社会主义体制越来越成熟和完善,科技进步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应当说是可以实现并留有余地的。

再次,这一战略目标强调要有步骤、分阶段进行,既反对了片面强调困难、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前途消极悲观的态度,又防止了脱离我国国情、急于求成,企望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的急躁冒进倾向。

第四,这一战略目标用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把目标加以量化,明确、实在,可以进行国际比较,也避免重犯不顾经济效益,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错误。

第五,把战略目标与人民生活水平联系起来,通过科学计算,用诸如“温饱”、“小康”、“中等”等标准直接勾勒出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战略目标的逐步实现而达到的程度,使人们从自己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切身体验中清楚地看到现代化目标实现的过程,从而坚定实现现代化的信心,并自觉为之奋斗。

五、几点宝贵的启示

其一,制定、执行发展战略,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真正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经济发展战略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这就要求必须对国情有一个清醒、冷静、客观的认识,充分考虑到我国资源、经济、技术、人口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真正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特别是对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和条件有足够的认识,以便有针对性地寻找对策。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就不能定得太高了。原来提的15年左右实现工业化,后来毛泽东提出50~70年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再到后来提的到20世纪末“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等这些目标显然过高。因此,赶超战略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指标与速度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当指标与速度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荒唐地步时,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就会走入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相悖的逻辑迷宫。

其二,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应追随时代潮流与世界发展大趋势。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几代共产党人所孜孜以求的理想。毫无疑问,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因此,现代化的内涵,不再仅仅指经济、科技的现代化,而是社会的全面的现代化。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没有认清时代潮流与世界发展趋势,在战略目标上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和衡量指标,没有考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并进,更没有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来设计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不重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尤其是长期忽视民主和法制建设,结果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从另一个层面讲,尽管我们重视了经济、科技,但由于整个国家都陷于阶级斗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所以长时间我们的社会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与发达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在拉大。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国敞开其广阔的胸襟,延揽八面来风,使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也与世界潮流相契合。

其三,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并选择正确的发展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任何一个发展战略,其核心都是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进步,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现代化的实现问题。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在相当长时期内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视程度不够,正如邓小平所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¹⁶结果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

况,与我们对主要矛盾的误断有关。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偏误,导致了我们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到抓阶级斗争上,导致了现代化主题与主要矛盾的二元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再三强调要发展生产力,并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思想,极大地调整了人们衡量社会主义优劣标准的意识流向。另一方面,在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没有从根本上破题。在处理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关系方面,毛泽东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生产力的基础的、决定的作用。在实践中不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要求来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企望以越来越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构建以“一大二公”为主要特点的所有制模式。与此相联系,我们过分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进而提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观点。在当时情况下,政治往往具体化为阶级斗争,实际上是用阶级斗争促进经济建设,亦即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不成功的建设之路。

其四,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经济发展是受各种经济规律支配的,我们只能在正确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来发挥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则,便要受到规律的惩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一种生产力水平跃进到另一种更高的水平,需要在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方面发生一种质的变化。这种生产力的跃进,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决不是靠一时的冲动、短时间的革命激情所能奏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5卷,27、130、138~139、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17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77、36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李安增:《毛泽东的赶超战略论析》,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2)。

11《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1),30页。

10《周恩来选集》,下卷,439、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2 13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226、9、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天津 300191
曲阜师范大学 曲阜 273165)
(责任编辑:曾国安)